

# 农户生计方式对农村生态的影响及其协调策略

——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个案

苏 磊, 付少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变迁, 农户生计方式日益多样化, 由单一的种植转向养殖、林果业、外出务工、经商等。选择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户如纯农户、农兼户、兼农户对生态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应通过细分农户, 加大扶持; 调整生态退耕政策; 推进生态中心村建设等策略, 加大生态建设力度, 协调不同生计方式农户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实现农村生态的改善与保护。

**关 键 词:** 生态建设; 农户; 生计方式; 陕北; 黄土高原

中图分类号: C913.9; X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1)03-0047-08

##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easants' livelihood in Loess Plateau of north Shaanxi

SU Lei, FU Shao-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peasants' livelihood in north Shaanxi Loess Plateau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diversified, and the impact of peasants' livelihood on ecological system has also change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ecological improvement of Loess Plateau of north Shaanxi can be realized by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well-coordin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easantry; means of livelihood; North Shaanxi; Loess Plateau

### 一、问题的提出

生态建设是人类理性行为参与下积极的生态恢复与重建过程, 但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生态建设一直困扰着人们, 很多生态建设措施因为没有及时调整改进而适得其反, “如果从现实的角度观察我们对环境问题采取的治理政策究竟给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经常会发现, 无论是环境破坏本身还是针对环境问题出台的环保政策往往都使当地人的生活状况下降, 很多人因之陷入贫困”。<sup>[1]</sup>造成这种有意设计的未曾预料的后果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生态建设缺乏对“当地人”(农户)的关照。

事实上, 农户在生态保护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农户通过种植、畜牧、灌溉、薪柴等生计活动, 直接与草原、森林、土地、水源等生态要素发生联系, “对中国多数生态比较脆弱的农村地区而言, 农户作为最主要的行为主体, 是本地生态系统的主要作用者。生计行为作为农户最主要的行为, 从自然界获取维持生计需要的生产和消费资料, 从而成为生态系统主要的人为干扰因素”。<sup>[2]</sup>譬如单单国家实施生态退耕一项, 全国就涉及 3 200 万农户, 1.24 亿农民。<sup>[3]</sup>

学术界对农户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主要观点如下: 在生态保护中, 因为生态环境具有公共性, 产权无法明确界定, 农户保护环境的收益难以内部化, 环保激励微弱。虽然农户对一些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生产行为有较为

收稿日期: 2011-04-30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西部行动计划资助项目 (KZCX2-XB 2-05)

作者简介: 苏 磊(1984—), 男, 甘肃合水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明确的认识,但农户为了自身生活需求的满足,很难采取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sup>[4]</sup>在生产要素和外部条件的制约下,农户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通过增加灌溉面积,增大畜群密度,毁林开荒等方式来实现利益最大化,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总之,农民短期性的逐利行为、粗放低效的生产经营、落后的环保意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等,造成了一系列生态恶果。农户保护生态的直接动力来自国家的生态补偿,生态补偿费用大于或者等于农民生态建设的成本,而且能够足额到达是调动农户积极性的关键。<sup>[5]</sup>国家对农户提供粮食补贴和经济补偿,增加农户收入,节省农户的物资和劳力,<sup>[6]</sup>“使农户逐渐转出那些相对‘不利于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的种植业,转入‘环境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林业、畜牧业和非农产业”,<sup>[7]</sup>“从根本上提高和改善农户的生存状态,才能达到持续利用与保护农村环境的最终目标”。<sup>[8]</sup>永久性发放财政补贴、提高农户的贴现值、稳定农户预期、<sup>[9]</sup>鼓励农户兼业,降低农户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sup>[10]</sup>提高农户的生计能力<sup>[11]</sup>等,是调动农户生态保护积极性的重要方法。

通过文献梳理可发现,长期以来,主流研究普遍持“国家主导”的宏观视角,以国家和社会的生态利益为出发点,对农户持一种责难态度,国家以“设计者”、“引导者”、“动员者”、“帮扶者”的角色出现,农户是被动的接受者。研究对农户意愿关照不够,对生态建设中农户生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从农户生计的角度对生态建设进行反思。

生计即谋生的办法。该概念有两层涵义,首先指生活的状况,其次指为生存而谋划,产生计策。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对生计概念做了最为精当的界定:“生计是谋生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用权)和活动的基础上”,“当一种生计能够应付、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的”。<sup>[12]</sup>相应的,农户生计是指农户为了生存和发展而采取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的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果。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指农户谋生方法由单一到复杂,由同质性到异质性的变

化过程。如果农户能有效抵御风险,资产保值增值,谋生能力增强,生产活动不破坏生态环境,生活改善不是建立在对他人利益直接损害的基础上,那么,农户的生计就是可持续的。一般来说,一个理性的农户往往会选择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和可持续的生计目标(预期),但现实并不总是如此,在特定背景之下,农户往往会选择其他的生计目标。

“对社会政策进行评估时一定注意倾听政策用户的声音”。<sup>[13]</sup>生态建设效果如何,作为受众的农户最有发言权。生态建设应该有两个基本的评价标准:一是能够改善生态,例如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加;二是与农户生计相协调,生态建设有利于农户生计可持续而不是使农户陷入生计困境。两条标准中,农户生计是否可持续,是否与生态建设相协调,是生态建设成败的关键。只有协调好农户生计与生态建设的关系,使农户生计在不破坏生态环境,乃至促进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持续改善,生态建设成果才能维持,生态建设才是有效的。笔者拟从农户生计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陕北黄土高原生态建设区农户的生计状况、不同生计方式农户与生态建设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探寻农户与生态建设相协调的方法,以期为实现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生态恢复与农户生计改善的双赢提供借鉴。

## 二、农民生计方式及多样化成因

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长城沿线以南,渭北高原以北,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榆林市南部六县和延安市甘泉县以北8个县,232个乡镇,242万人口,土地总面积327万 $\text{hm}^2$ 。全区耕地面积110.6万 $\text{hm}^2$ ,其中大于 $25^\circ$ 陡坡耕地面积41.04万 $\text{hm}^2$ ,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0.48 $\text{hm}^2$ 。该地区气候干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90%以上,区域生态环境恶劣,人与自然矛盾突出,生态建设压力巨大。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的生态建设政策,陕北黄土高原因其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成为国家生态建设最早和力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笔者在榆林市的榆阳、米脂、绥德三县区中选取了榆阳区鱼河峁镇白家沟村、米脂县高渠乡马家沟村、绥德县崔家湾乡雷家沟村作为研究地点,采

用问卷调查与典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共收集有效调查问卷307份。研究选取的三个村庄兼顾到了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生态多样性,在地理地貌方面,兼有台塬村落和沟谷小流域村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既有繁荣村落,也有衰败村庄,样本选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的重点包括农户的主要生计方式及特征,选择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户对生态的影响。

### 1. 农户主要的生计方式

(1) 种植。种植是陕北农户最传统、最基本的生计方式。在调查的307个样本中(在村农户),只有3户没有从事种植业。农户的耕地面积最多达35亩,最少2亩,户均12.75亩,32.6%的农户的耕地面积超过15亩。农户的耕地质量普遍不高,60%的耕地为无法灌溉、水肥流失严重的低产坡地,30%的耕地为较为平坦但无法灌溉的梁峁台塬地,只有10%的耕地为能够灌溉的沟谷滩坝地。

农户在坡地种植低产耐旱的小杂粮,主要为糜子、谷子、豆类、马铃薯等,在沟谷地带种植高产的玉米、蔬菜等作物。坡地不能灌溉,水肥无法保障,全部靠天吃饭,产量低,收益小。在几种主要的小杂粮中,一亩坡地可收黄豆200斤,亩收入为400元(单价2.0元/斤,按2010年6月当地市场价计算);谷子亩产300斤,收入450元。在坡地种植其他作物的收益与上述作物相近。滩坝地平坦易灌溉,水肥条件好,作物产量高,玉米亩产量可达1000斤,收入800元,但沟谷滩地在农户耕地面积中所占比例很小,平均每户只能分到1-2亩沟谷滩地,有些地方农户的沟谷滩地平均不足1亩。

样本农户的种植业年平均收入为4141元,最大值为30000元,最小值为100元。其中,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农户占总样本的23.12%,收入在1000-3000元的农户占28.49%,收入在3000-5000元的农户占22.58%,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间的农户占19.35%,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农户占4.30%。

(2) 务工(包含经商)。在调查样本中,88.53%的农户有劳动力参与外出务工活动,65.81%的农户至少有一个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成员外出务工(经商)年收入最高达130000元,最少0元,

户均务工年收入12880元。农户外出务工的家庭主要劳动力中男性占72%,女性占28%。青年务工者普遍不能积攒收入,养家糊口者主要为中年男性外出务工者,他们主要在采矿、工程建设等行业就业。以修筑高速路为例,苦力型务工人员每天工作10小时,收入在80-120元左右,年务工毛收入在18000元左右,这代表了陕北农民外出务工的普遍水平。

短工是农户在村人员的主要务工方式。在村人员利用空余时间在本地做零工赚取工资。这种形式给那些不能外出务工却又缺乏就业机会、劳动力不能充分使用的农户成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是农户补贴家计,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短工工作与农村密切相关,如乡村修路、农田锄草、林果采摘等。工资水平为男性每天60元,女性每天50元左右。

(3) 养殖。养殖业是陕北农户传统的生计方式之一。调查样本中,24%的农户饲养有大型役畜,主要为黄牛、骡、马、驴,户均2头,用于耕地和拉车。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的开展和农业机械的普及,必须使用畜力耕作和运输的坡耕地减少,大型牲畜作为畜力使用的必要性大为降低;大型役畜繁殖慢,经济效益低;大型牲畜对生态环境破坏大,封山禁牧后,大型牲畜不能在野外放牧而必须舍饲,这必然增加劳动力投入和饲草料费用支出;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大型牲畜看管困难,等等。这些因素都导致大型牲畜数量在农村急剧下降。

山羊因为具有繁殖率高、适应性强、易管理等特点,成为陕北养殖业的主要畜种,农户养羊主要用于积肥、出售。调查区在退耕还林、封山禁牧之前,传统粗放式放牧业十分发达,几乎每户一群羊,数量从十几只到几百只不等。自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封山禁牧后,放养被严厉禁止,养殖方式逐渐转变为舍饲圈养,山羊数量剧减。样本户中,有27.42%的农户养羊,数量从1、2只到60、70只不等,户均19只。养羊数在20只左右及以下的农户基本采取舍饲圈养,利用农作物秸秆与退耕还草所产的紫花苜蓿喂养。据测定,一亩良田种草可养羊6-8只,收入是粮食作物的3-5倍。但也有4.84%的农户采取舍饲与偷牧相结合的方式。养羊户均收入3175元,最大值为9500元,最小值为400元。

养羊效益尽管明显高于种地,但农户舍饲圈养

山羊的规模普遍很小。养羊数量在 20 只之内,农户自产饲料可以满足饲喂,只需一个家庭次要劳动力,老人、妇女即可完成。如扩大规模,则饲草料不足,购买饲草料的现金支出和圈舍投资成本增加,舍饲用工也增多,这决定了舍饲圈养只能作为农户多样化生计方式中的一种,而不占主导地位。

(4) 林果业。调查户在退耕还林之前没有一户从事林果业。林果业是在退耕还林政策扶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陕北退耕还林的经济林木主要为大扁杏与红枣。经济林木成长周期长,需要坚持不懈管护数年后才能产生效益。调查样本中,有 75.25%农户拥有经济林;58.99%的农户管护不力,任由经济林自生自灭;38.71%的农户经济林产生收益。在有收益的农户中,有 23.02%的农户经济林取得 1 000 元以上收入,其中 8.63%农户经济林管护良好,收入在 3 000—10 000 元间,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在白家沟村,一名妇女家有 8 亩经济杏林,每年施肥 8 袋,一亩地可收杏核 250 多斤,杏核收购价为每斤 4.3 元,总收入 8 000 元。相比较,种地要连续地耕种、施肥、锄草、收割,人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离开,而经济林可以在春天施肥、修剪、锄草后任其生长,只待秋天采收,平时几乎不用管护,省时省力,产量高、效益好,不但直接增收,还使农民有更多时间务工赚钱。不过,尽管经济林收益良好,也仅有少部分农户得到效益,但大部分农户因为当初在退耕还林政策实施时对政府规划不抱信心,或者短视,或者人手不够,或者懒惰,或者转变生计方式,没有认真栽树和管理,当然没有这项收入。至于生态林,因其成林速度慢,林木质量差,不能给农户带来直接收益,农户很少管护。

## 2. 农户生计方式的多样化成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小农家庭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很难找到其他就业机会,农户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就是投入劳动力到报酬极低的农作劳动中,通过扩大播种面积和增加单位土地的劳动力投入来获取总量最大化,农户生计方式单一,同质性强。直到 1978 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农户替代生产队组,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农户作为农业生产与收益分配等经济决策的基本单位,<sup>[14]</sup>

“接踵而来的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对于尚未工业化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来说,则是开启了非农化的大门”。<sup>[15]</sup>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使农户有了自由选择生计方式的可能,陕北地区的农户也不例外。

陕北农户纷纷改变以往单一的种植生计方式,开始转向养殖、林果业、外出务工、经商等,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生态自然条件差,务农劳动强度大,粮食产量低。访谈中,农民将陕北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形象地描述为“春种一面坡,秋收半袋粮”。总之,种地不赚钱,很难维持生活。以种粮为例,近 10 年来,种子、农药、柴油等价格涨了几十倍,而粮食价格只上涨了 6 倍,分散种植粮食的农民不能得到收益。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开始摆脱“水深齐颈”的糊口生计水平,日益表现出社会化小农的特点,主要生存压力渐变为医疗、教育、社交、买房、结婚等现金支出压力。由于务农效益低下,不能满足生计需要,于是“非农化和兼业化成为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响应利润最大化追求过程中规避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理性计算的结果”<sup>[16]</sup>。务农不再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是起到降低家庭食物支出的作用,变成农户多样化生计方式中的一种。

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多样化就业成为可能。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同时也是农户离农离土的非农化过程,年轻人外出打工,农民入城定居。陕北农村自然条件恶劣,农民改变原有生计方式的要求更为强烈。就调研的三个村庄来看,白家沟村是当地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村落,全村 211 户,785 人,有 72 户举家离村;雷家沟村 113 户,440 人,20 户离村;马家沟村 187 户,823 人,有 63 户离村。留在村里的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三十多岁的人很少见,四五十岁的人在村里可以算年轻。可以说,这几个村庄能够外出的人员都外出了。不仅仅是笔者调查的这三个村,这一现象在陕北地区已十分普遍。像绥德一些乡镇有的村庄人口减少幅度达 60%~85%,一些偏僻村庄已鲜有人语声了。

观念与风气转变。年轻一代农民普遍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乡土观念淡薄。年轻人不得不外出,就算不是经济原因,单农村女孩都外出这一

点(女孩外出见过世面,就不会回村),男孩就只得外出发展对象。女孩结婚的首要条件是在城买房,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年轻人被迫入城谋生,或者举家贷款在城买房,游走于城市而不回乡。从农村住房状况来考察,白家沟村和雷家沟村有三分之一、马家沟村有二分之一的住房无人居住,许多美观耐用的箍窑都大门紧锁,乃至废弃,村庄鲜有新建房,最新的也为十几年前所建。这些现象表明,陕北农民正逐步脱离农村这个传统的日常生活场域,生计方式呈现非农化和多样化的趋势。

### 三、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生态的影响

生计方式多样化促使农户分化。农户成员外出谋生,许多农户变为非农户,农村居民减少,自然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减轻,这构成了农村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背景。对于那些仍然居村谋生的农户而

言,他们的生计方式也在变化,生计方式的生态影响也有所改变。根据调查资料和前述农户主要的生计方式,可将农户按兼业程度分为纯农户、农兼户、兼农户等三种类型。纯农户指家庭主要劳动力长期从事种植、养殖等生计方式且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农林牧业的农户;农兼户指至少有一名家庭主要劳动力长期从事种植、养殖等生计方式的农户;兼农户指家庭主要劳动力在外务工、经商,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收入,由留守老人等非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事种植、养殖的农户(表1)。那些虽然在身份上属于农民,而实际上既不居住在农村,也不直接从事农林牧渔生产的,事实上已经转变为城镇居民的“农户”不在分类之中。在调查的农户中,纯农户占 31.18%,农兼户占 49.46%,兼农户占 19.35%。

表1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收入情况

农户类型	元							总收入
	种植业	养殖业	林果业	务工	经商	退耕补贴	其他收入	
纯农户	4 328	1 201	8 778	693	491	1 180	343	17 070
农兼户	4 900	1 007	4 540	17 475	8 689	1 095	64	37 827
兼农户	1 900	2 413	910	20 769	46 805	735	202	68 280

随着农户的分化,选择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户对生态的影响也表现出很大差异。

(1) 纯农户。纯农户的主要劳动力都在农村就业,从事农林牧业生产,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户。纯农户与农村联系最紧密,是农村生态环境的主要作用者。纯农户可以细分为困顿纯农和农业大户(指小农中的农业大户,区别于作为农业资本家的农业大户)两种类型。

一类是困顿纯农。陷入生计困境的纯农户主要是那些患病、年老、出现重大灾祸、生活困难的弱势农户,他们缺乏各种生计资本,只能从事传统的种养业。困顿纯农在调查农户中的比例约为 15%。困顿农户的典型如调查样本的 15 号农户,户主 BHX,现年 40 岁,妻子去世,父亲 80 岁,丧失劳动力,母亲 70 岁,可以干农活和家务,大儿子 15 岁,残疾,小儿子智障,全家因贫致病,因病致贫。该户有耕地 8 亩,种植谷子、黄豆、马铃薯等杂粮,除部分自用外,其余出售,可收入 2 000 元。其他收入有种粮直补 300 元,退耕 10 亩年获补贴 1500

元,两亩大扁杏收入 350 元。另外一项主要收入为低保,每人每年 600 元,共 3 000 元。上述收入全部用于食物、农资、看病支出,没有结余。

一般而言,农户的生计方式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生计方式的短期性与环境影响的长期性;生计方式的个体性与环境资源的共享性;生计方式的针对性与环境政策的普适性。就困顿农户而言,一方面,他们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他们缺乏其他谋生渠道,最熟悉的生计方式便是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源。这部分农户耕地质量普遍不好,为了维生,耕种大量坡耕地,广种薄收,延续着传统的“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生计方式,加剧水土流失。由于经济困难,部分困顿农户采取放养山羊的策略,直接利用自然界草源,节省饲草和舍饲所需投入。困顿农户在能源使用上也主要采取樵采方式。在调查区,一吨煤 600 元,一户年均需要 2 吨,困顿农户无力支出这笔钱,只能使用生物质能源,砍柴做饭。另一方面,困顿农户同时又是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潜在力量。困顿农户主

要劳动力在农村,有管护山林草场的劳动力资源,退耕补贴在他们的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可以说是退耕补贴与低保共同保证着困顿农户的最低生活水平。这对他们的效用最大,激励也最大。

另一类是农业大户。农业大户占调查农户的16%,其特点是家庭主要劳动力都投入在农林牧业中,以农林牧业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与困顿农户的最大区别是,困顿纯农由于诸多因素制约,被动从事农林牧业,他们从事农林牧业主要为糊口,而农业大户则是一种积极的经营行为,将劳动力、资金主动投入到农业,以经营农林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典型的农户如白家沟村白生军家,夫妇均40岁,两个老人70多岁,一双儿女上高中。夫妇两人均留村发展种养业,是陕北农村常见的种粮大户。他们不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主要原因有:家人团聚,相互照顾;村庄大量劳动力外出,可以租种,乃至免费耕种他人耕地,务农规模扩大;政府扶持农业,推广农技,补贴种粮,务农效益提高;在村务农收入可以满足家庭开支需要,与外出务工收入接近,能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该户退耕后自有耕地12亩,无偿耕种外出户耕地8亩,共计20亩,作物有谷子、豆类、玉米等,种地年收入12000元;退耕还林15亩,主要为侧柏与大扁杏,经过多年管护,大扁杏已经进入丰产期,年收入7000多元(每斤杏核3.8元);领取退耕补贴1500元;种植紫花苜蓿5亩,舍饲养羊20只,全部为改良绒山羊,年收入6000元;低保600元;年总收入30000多元。在家庭支出方面,居村生活费用低,年总支出为12000元,主要为孩子上学、老人医疗、食物和日常支出。家庭拥有电视、冰箱、洗衣机、摩托车、电话等生活用品。在生产方面,有一辆拖拉机、一台铡草机和脱粒机、一头耕牛。在能源利用方面,农业秸秆可以满足冬季取暖需要(陕北农户烧炕取暖),使用煤气做饭。

就农业大户而言,一方面,他们对生态环境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土地产权的相对不明确和现实中经常出现的重新划分,农民对土地难于形成长期拥有、长期使用的意识,于是,农民只管短期的增产,大量使用化肥而不管土地的长期肥力,农民也不愿意对土地设施进行长期性投资,这造成影响长期农业发展的农田水利设施失修

严重,土地肥力普遍下降,而能够发挥即时效果的化肥使用却过多过滥。这一点在农业大户无偿耕种本村外出户耕地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农业大户有较充足的人力从事农林牧业,劳动者素质较高;拥有较为丰富的金融资本,能对生产进行投入,使用农机提高农作效率,能够平田整地,减少水肥流失,保证产量;拥有较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无偿或低成本耕种他人闲置的耕地,减少土地抛荒;有足够资金和人力(劳力与智力)管护经济林和生态林,经济林有收益后不仅构成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具有示范效应,能够刺激其他农户也逐渐重视经济林,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者兼得的良好效果。农业大户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低效、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利于减轻生计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

(2) 农兼户。农兼户采取亦农亦工(商)的兼业方式维持生计。农兼户在家庭主要劳动力配置方面,一般丈夫外出务工,妻子在村务农,或者子女外出务工,父母居家务农。陕北地区大面积坡地耕种困难,产量低下,退耕还林后农户耕地面积减少,单纯务农并不能维持家庭生活,需要开拓新的收入来源点。农兼户以务工获得主要收入,种植作为补充。农兼户这种劳动力配置方式灵活高效,有效提高了劳动力的使用程度,最大化扩展了家庭的收入来源,既考虑到增收的需要,又通过兼业降低生计风险。农户一旦外出务工失败,还有农业作为维持生计的底线。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户食物支出费用增加,家庭有劳动力务农,生产粮蔬满足家庭需要,节省开支,不失为一种经济有效的做法。调查样本中一名妇女家是典型的农兼户,妇女持家务农,丈夫外出务工。妇女一人种地15亩,年收入6000多元;4亩经济杏林收入3200元;丈夫农忙时节回乡帮农,农闲外出搞建筑,年收入近20000元,全家年收入30000元左右。

农兼户有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客观上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可能性。由于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农兼户的耕地面积减少,主要耕种一些质量较好的土地,放弃坡地,有利于水土保持。同时,农兼户又有家庭劳动力居村管护林木,发展林果业,有利于农村生态系统的整体建设。统计显示,家庭有劳动力在村的农户其生态林管护较好,经济

林也较多产生收益。

(3) 兼农户。兼农户的主要劳动力均在外就业, 家庭多为老人和小孩居村。兼农户的留守老人有些不种地, 有些耕有少量平地。兼农户在经济来源上已经不依赖于农业生产, 其发展趋势是离村离农, 逐步脱离农村日常生活实践。因此, 兼农户尽管享受了国家退耕还林补贴, 却未能履行管护义务。他们不会花太多精力发展农林牧业和管护林木, 没有进行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积极性。兼农户大部分家庭成员仅仅在户籍上隶属于村子, 从不或很少回村, 他们的耕地大多出租或赠与他人耕种。

兼农户对生态建设也有有利的一面。从生态建设的角度看, 人首先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力量, 兼农户离开农村实现非农就业, 客观上减少了本地生态环境的人口承载量, 给生态恢复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陕北农村生态建设能够取得成效, 一个基本条件是农村居民大量流出从事其他生计活动, 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 四、农户生计方式与生态建设协调策略

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好转的根本途径是对丘陵山区居民实行历史性的战略大转移, 减少人口数量, 建设生态大后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户生计方式的多样化、非农化, 大量农民入城务工, 经济拉力使许多住民外流外迁, 和以前相比, 封闭的人口-生态资源系统被打破, 村庄乃至整个区域可以向外输出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输入资源, 人对生态的压力降低, 为生态恢复创造了重大契机。因此, 必须牢牢抓住这一生态建设的历史机遇, 保障农户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协调好不同生计方式农户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才能推进生态建设, 实现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目标。

##### 1. 细分农户, 加大扶持

根据农户的分化情况, 对农户进行分类支持。对于进城农民, 要改革户籍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解决进城农民住房、就业、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困难, 给予进城农民市民待遇, 保证进城农民能够进得去、留得下、过得好, 推动农村人口加快转移; 对于陷入生计困境的弱势农民, 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随着陕北生态条件恶劣区人口的不断外流和外迁定居, 这些地区的人口终将减少, 村落消减乃至

变成无人区。在这个过渡时期, 应做好生计困难农户的社会保障工作, 以保障换生态, 减缓困难人员因生存压力而破坏生态环境; 对于居村发展的农户, 要推行注册农户制度,<sup>[17]</sup>强化瞄准机制, 扶持农业大户和林业大户, 支持真正的农业从业者, 在他们中间推广农技, 提高效率, 发展生态农业。相对于细密复杂的工业生产技术, 农业生产中的施肥、嫁接、锄草、农机操作、保鲜、初加工等技术简单易学, 农村精英大量外流后的留守农民完全能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体, 技术的推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留守劳动力在体力和智力上的不足, 改变生产方式, 促进农民增收。

##### 2. 调整生态退耕政策

第一, 增加指标, 继续生态退耕。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形破碎, 植被衰退, 水土流失严重, 需要继续生态退耕。农户退掉收成极低的坡地, 补贴基本能弥补种地收入, 因此农民要求继续退耕的呼声很高。政府应该顺势而为, 继续在生态恶劣区退耕还林还草。应该看到, 退耕补贴对农户的激励很大, 既能保障农户生计, 减少他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压力, 又充分利用留守人口的人力资源进行生态建设, 更能依托生态退耕发展林果草畜业, 促进农户生计方式的转型。

第二, 调整生态林与经济林比例。生态林不能给农民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农民管护积极性不高。陕北干旱贫瘠, 生态林没有施肥管护, 生长缓慢, 难以成林发挥效益。在农户生计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之前, 大建生态林没有群众基础, 农户还可能出于生计需要毁坏生态林, 更谈不上尽心管护, 所以, 目前生态林成林不佳, 生态保护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相比较而言, 经济林能够给农户带来经济效益, 因而调动了农户管护的积极性, 经济林也能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作用。所以, 只有经济林果业先行发展支持了农户生计, 生态林才有存在的基础。传统上, 陕北黄土高原形成有沿黄红枣带、丘陵区仁用杏基地、无定河与清涧河沿岸梨基地三大经济林果带, 只有立足现有基础, 优化区域布局, 大力调整品种和产品结构, 形成产业集群, 构建比较完备、比较发达的林果产业体系, 才能切实促进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第三, 重视退耕还草与草畜产业的培育。陕北

年降水量在 350—550 毫米,旱坡适宜种草和灌木,阴坡适宜种植乔木。地方政府和农民因退耕还草补助低、时间短而不愿还草,也没有和本区畜牧业的传统有效链接而培育草畜产业。坡耕地种紫花苜蓿,正常年份每亩可产干草 500 千克,产值为 300 元,如果用来喂牲畜,每亩可饲养 2—3 只羊,林草养殖小尾寒羊 20 只,年收入最高可达 8 000 元,这些工作妇女与老人可以胜任。如果重视退耕还草与草畜产业的培育,既可发挥还草的生态保护作用,也有助于解决农户生计问题。

第四,调整退耕补贴政策。应该借国家八年补助期满的机会调整补助政策,对离村农户停止补贴。离村农户客观上存在着领取补贴而不能履行管护义务的问题,他们也不在乎补贴收入。所以,应该探索将这部分资金转移支付到在村农户,在村农户有管护的人力和意愿,退耕补贴对他们的激励效用大,既能调动他们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又能保障在村农户的基本生计,还能培育农村林果草畜产业。

### 3. 推进生态中心村建设

结合陕北黄土高原区域地理自然条件、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生态建设的目标要求,应进行区域生态细分,根据自然条件进行评估,确立并重点建设生态中心村落。要突出中心村落的经济、社会、生态功能,完善基础设施,以中心村落为中心建设基本农田与经济林果带,构建以中心村落为内核的生态—产业圈,吸引区内自然条件恶劣地的农户移居。对位于自然条件恶劣区的处于衰落中的村落,要谨慎投资路、电、水,主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并通过经济的、工程的方式移民,移一户人家退一面坡,促使人口向阔塬、河谷等自然条件较好的中心村落集中。

### 参考文献:

- [1] 王晓毅. 农村环境问题与农村发展[EB/OL]. 2008-04-14, <http://wenku.baidu.com/view>.
- [2] 王成超. 农户生计行为变迁的生态效应——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10(26): 315-319.
- [3] 张鸿文.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更大贡献[J]. 林业经济, 2010(3): 8-11.
- [4] 连纲, 郭旭东.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农户对退耕政策及生态环境的认知与响应[J]. 生态学报, 2005(7): 1741-1747.
- [5] 王金南, 庄国泰. 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设计[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100-200.
- [6] 黄富祥, 康慕谊. 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的经济补偿问题探讨[J]. 生态学报, 2002(4): 471-478.
- [7] 徐晋涛, 陶然. 退耕还林: 成本有效性、结构调整效应与经济可持续性——基于西部三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04(1): 139-162.
- [8] 赫晓霞, 栾胜基. 农户经济行为方式对农村环境的影响. 生态经济[J]. 2005(2): 377-380.
- [9] 邵传林, 何磊. 退耕还林: 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J].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10(2): 116-121.
- [10] 黎洁, 李亚莉.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09(5): 29-38.
- [11] 谢旭轩. 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J]. 北京大学学报, 2010(3): 457-464.
- [12]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68-125.
- [13] 唐钧. 社会政策学科前沿研究[EB/OL]. 2007-09-19, <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tangjun>.
- [14] 刘守英. 土地制度与农民权利[J]. 中国土地科学, 2000(3): 1-9.
- [15] 杨善华.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一个社会学的视角[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2): 72-77.
- [16] 陈会广. 农户兼业化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分析框架及政策含义[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9(1): 4-20.
- [17] 党国英. 建议实行注册农户制度, 阻止资本大量进入农村租地[EB/OL]. 2010-08-08,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
- [18] 谷中原. 农村垃圾治理研究[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10(1): 34-39.

责任编辑: 陈向科